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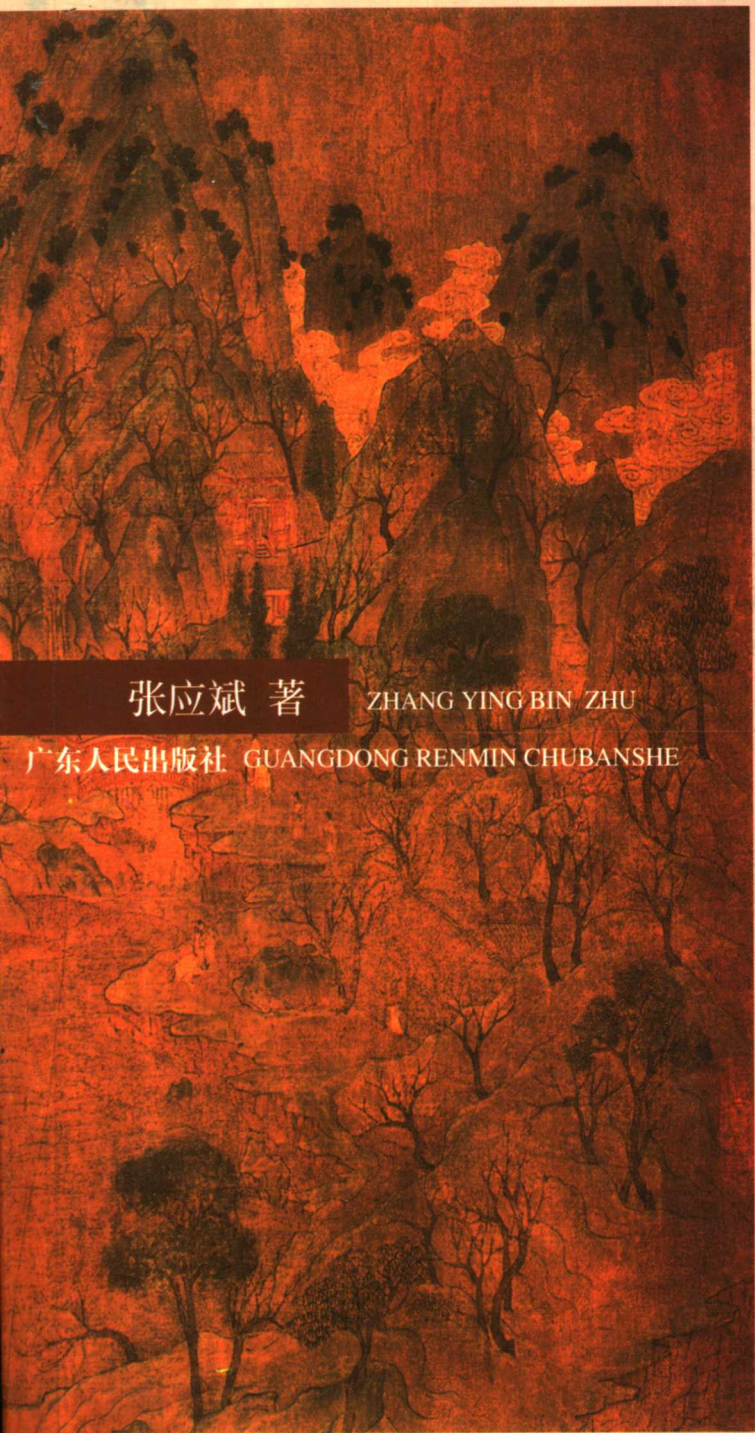
# 中国文学的起源

ZHONGGUO WENXUE DE QIYUAN

张应斌 著

ZHANG YING BIN ZHU

广东人民出版社 GUANGDONG RENMIN CHUBANSHE



# 中国文学的起源

张应斌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文学的起源 / 张应斌著. —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3.9

(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著作出版基金丛书)

ISBN 7-218-04328-3

I. 中... II. 张... III. 文学史—中国 IV. 1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08346 号

---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印 刷	广东肇庆市科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毫米 × 1092 毫米 1/32
印 张	17.125
插 页	1
字 数	32 万字
版 次	2003 年 9 月第 1 版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000 册
书 号	ISBN 7-218-04328-3/I·606
定 价	3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公司联系调换。

张应斌，1951年生，湖北利川人。1982年元月毕业于华中师范学院（今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1982-1993年任教于湖北民族学院中文系，1993-2002年任教于嘉应大学，2003年至今为湛江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发表《祭礼与文艺复古》、《周代的农业文学》、《中国哲学的本原问题》、《中国认识论的本原问题》、《土家族女神及其文化意蕴》等论文百余篇。



本书引入文化人类学、考古学和发生学等学科的方法和成果，把中国文学的起源放在人类和人类文化起源的背景下来考察，分别从语言的起源、诗体的起源、文人的起源、文学观念和文学方法的起源等方面来探讨中国文学起源的历史进程，在研究方法、资料和结论上都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对中国文学起源史的研究有重大的拓展。

广东优秀社会科学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 序 一

### 卞孝萱

1999年5月25日至6月2日，我到汕头、潮州、梅州三地讲学，与嘉应大学中文系主任张应斌先生相识。虽是初次见面，但我对他为人的诚恳谦虚，办事的认真负责，治学的执著严谨，留下了良好而且深刻的印象。他十分郑重地将新著《中国文学的起源》书稿给我审阅，征求我的意见，并希望我写序。6月2日，我将书稿带回南京，排除百事，专心阅读。一旦进入书稿，时时感到一股清新气息，扑面而来，不禁为之心旷神怡，爱不忍释。

应斌先生在完成这部书稿之前，其部分前期成果曾以论文的形式，在国内期刊上公开发表过9篇，其中3篇为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所采用。全稿于1998年完成，共8章，30余万字，其主旨是：探寻中国文学的初始形态，研讨现存文字资料之前的创作情形，包括原始语言的特点、初级作品的形式、无名氏作者的身份三个既有联系又相对独立的论题。

读过书稿之后，深感《中国文学的起源》是一部开创性的力作。我以“新”字来概括这部书稿的特色，具体有四：

课题新。关于中国文学的起源，一般《中国文学史》中的论述，显然不能使人满意，更未见到这方面的专著。这是一个

艰难的新课题，一个布满荆棘、不易开发的新领域，人们惮于问津。应斌先生独具慧眼，知难而进，锲而不舍，探得奥秘，以其出色的成果，填补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

方法新。应斌先生充分借鉴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语言学等研究方法，广泛采取多角度的审视观照与多学科的交叉联系，将中国文学起源这个新课题置于人类起源和文化起源的广阔背景中把握，思路新、方法新，侃侃而谈，娓娓动听，使人感到耳目一新，兴味盎然。

资料新。史前文化史研究，能够直接利用的文献甚少，要在相关的旁证资料方面下大工夫。应斌先生以其新的视野，从古今中外各原始民族、少数民族的大量文献中发掘同文学起源的相关资料，“寻坠绪之茫茫，独旁搜而远绍”，书稿引证丰富而扎实，展示出著者的专注精神和驾驭材料的深厚功力。

观点新。新的课题，新的方法，新的资料，必然会产生新的观点。书稿新见迭出，略举一二：著者提出人类语言产生于人文之初，文学艺术相应发生，并非等到集体劳动中才萌芽；中国文学在四言诗之前，曾经有过二言诗、三言诗的创作阶段；在春秋之前，残疾人广泛从事文化活动，他们是由民间歌手向专业文人过渡的中介角色；先秦文学用逻辑上的类比思维规范文学色彩的形象思维，二者形成彼此交融而非相互割裂的关系；等等，皆发前人之所未发，成一家之言。

总之，从这部书稿在理论阐释的深度和资料征引的广度上，可以看出著者具有高屋建瓴的气势，俯仰古今的见识，博大精深学力，富于开拓的精神，它既是一部论述中国文学起源的开山辟道之作，也是一部当前不可多得优秀学术著作，可贵可重，可喜可贺！



6月2日之夜，在梅州火车站与应斌先生握手话别时，他对我说：“《中国文学的起源》书稿带有草创性质，一定还有不够成熟的地方，如果能得到海内外方家的指正，引出不同意见的讨论，我意已足。”像他这样虚怀若谷、谦卑自牧的学者，日新月异，今后必然会取得更为辉煌的业绩。故不揣浅陋，欣然为序。

1999年6月15日

于南京大学

## 序 二

### 王钟陵

我极少为人作序，因为自知浅陋，所以当一些朋友或青年同志希望我能为他们的书写篇序时，我都婉谢了。我和应斌同志至今未曾谋面，几年前，他曾想报考我的博士生，给我写过信，算是我们最早的接触。他对于学术的衷情，在这第一封信中，体现得十分清楚，因而给我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以后，我们都忙，没有更多的接触。他因为客观上的原因，也未能来考我的博士。今年他又给我来了封信，说他完成了《中国文学的起源》一书，并谈了他在学术上的一些打算。在广东这样一个商品经济相对发达的环境中，应斌同志能够如此刻苦地坚持做学问，立志研究这样困难的一个论题，并做出了成绩，这是很不容易的。近十年来，几度南下潮，目的都在淘金。我还知道，不少博士生毕业后都想到南方去工作，一些学校的青年教师也有这个愿望，这当然也无可非议，人有权利往待遇高的地区流动。但应斌同志身处其地，却立志坐冷板凳不就便利条件去赚钱，就我个人来说，是更加敬重这样的人的。在举世红尘滔滔之中，应该有这样一些人，哪怕人数很少，坚持做一些“呆事”，以便思想的园地中能有一片愈益长大的绿阴，以阻挡心灵粗俗化、荒漠化的蔓延。

此外，在高校工作久了，看惯了许多人为了评职称的需要，或主动或被动，写一些可以速成的书，或以草率的态度写一些拍脑袋式或是一知半解地附会时髦的论文，甚至袭用人家的论点而据为己有，这种所谓“论著”的学术价值，是可想而知的。我的朋友和学生就向我说起过一个大家传为笑谈的例子：有人著文将男作家写出以女性为抒情主人公的爱情诗词，视为是男作家的性变态，甚至举到了林黛玉的《葬花诗》作论据之一。这虽然是个极端的例子，却是时下一种将学术当作商品，当作谋取名利手段这样一种恶劣倾向的必然结果。什么叫学术，长期以来一些人似乎已不明白了，它成了一只饭碗；只要发表了、出版了，就堂而皇之算是成果了，还洋洋得意；艰难的以致是开创性的题目与炒冷饭的、低等次的题目，这两者间价值之悬殊，是不被许多人放在心上的。在这样一种风气相当程度上颇为得势的情况下，应斌同志能够以数年的时间，钻研文学起源这样一个甚难着手的问题，同一些所谓“聪明”人相比，他是有些“呆气”的，但正是这种“呆气”，使我明白了应斌同志是一位真正献身学术的有志之士。中国的学术之有希望，就正是因为我们有着一批真正的诚实学人。有感于此，为了能在继续张扬一种诚实的学风上出一份力，所以我同意将我读应斌同志这部书的一点感想写下来，算作此书的序。

我读应斌同志这部书，最大的感觉，是他的路子新。中国老一代学者中有一个观点，认为一个人的学问如要做大，不在先秦学问上下功夫，是不行的。这一看法十分正确，因为先秦文化确是此后中国文化的源头。但我们如果想在先秦文化的研究上有所突破，就不能仅仅沿袭前人的道路，落人窠臼，而需要寻找新的视野。我们应该想到，先秦文化其实也还有其源

头。正是在这一点上，可以找到先秦文化和文学的新的切入点；而西方文化人类学的发展，积累了大量的成果，又正可以供我们获得一个超越前人的新的学术制高点。有鉴于此，我在20世纪（本书年代未标明的均为20世纪）90年代初，写了《中国前期文化——心理研究》一书，目的在于研究人类精神的早期发展史及中国文化——心理特殊性之由来。利用文化人类学来重新审视中国早期文化，是一个庞大的工程，它需要更多的学人投身其中，遗憾的是，这方面的嗣响甚鲜，原因当然是它的艰难性。在90年代末，我终于又读到了从文化人类学来探求中国文学起源的这样一部书稿，自然是十分高兴的。

我在《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派的文艺观》（《学术月刊》1997年第8期）一文中曾说：“文化人类学或曰民族学在19世纪至20世纪的迅速发展，是人类学术发展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随着这一学科的兴盛，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的格局便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应斌同志此书由于具有文化人类学的视野，所以他的这部书，在整个气象上，便不同于时下的许多著作，而有一股扑面的清新气息。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提出了许多子论题，二是发掘了许多概念，三是作出了不少能够启发人的结论。举例来说，治文学史的人一般并不注意四言诗之前的时代，但应斌同志就提出，在四言诗之前，有一个二言诗的时代；治文化史的人在谈到文人的起源问题时，一般多注意巫及史，但应斌同志就提出了“君王型文人”的概念和“残疾人从文”的论题。由于气息的清新，这部书虽是一部理论著作，但其中许多部分，读起来却令人感到兴味盎然。

经过认真钻研，在某个或一些学术观点上有更新，是可能的，也是值得称赞的；但惟有方法与思路的更新，才能有全局

性的改观。我读应斌同志这部书，是愈加相信了这一点的。

在这部书中，应斌同志思想的触角伸展得很远，将文学问题置于人类思想进化的一个大的进程中来加以把握，并从多种角度来加以审视，使这部书显出了一种大气。从引证材料上，我们还可以看出，应斌同志读了很多中外书籍，在资料的发掘上下了很大的功夫，他的态度是审慎的。书中的相当一些资料包括一些少数民族的资料，很是可贵的。所以这部书，不仅因思路的更新而具有一股清新的气息，而且也因引证的丰富而让人感到扎实。

也许有的同志会不同意此书中的一些论点，这不要紧，可以充分讨论；重要的是新的论题、概念、观点的提出与争论，可以促进研究的深化。应斌同志自己也说了“前作难工，后出转精”的话，他希望由他这部书而能引出关于这一论题的鸿文巨著，他并不自以为是，他是谦虚的。

中国学术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时代需要也将造就一批有成就的学者，甚至是大学者，但要跻身这一行列，首要的条件便是对学术的真诚，不以世俗功利的心态来做学问，并要有探索与创造精神。历史将证明这样的人才有前途，而速成、草率者，炫耀一天写三千字甚至是八千字的人，必将被历史所淘汰。

一九九八年九月

于姑苏

引

言

---

树有根，水有源。任何事物都有一个起源，文学也不应该例外。

关于中国文学的起源，20世纪里常见的有两种追溯方式：一种是从“文”、“文章”、“文笔”、“文学”等概念入手来探索文学的起源，20世纪初谢无量等人编写的文学史，大都采用这种思维模式。另一种是西方文艺理论传入中国以后，从文学是起源于劳动，还是起源于游戏或宗教等等，来考察文学的起源。这两种考察或侧重于“文学”的概念，或侧重于文学理论体系性的观念，都没有真正抓住文学的源头。这些研究的实质，借用意大利维柯的话说，都是“从中途开始，也就是从已开化的各民族的最近时期才开始”<sup>①</sup>的研究方法，它们在实质上也并未真正解决中国文学的起源问题。

当然，这种现象自有其苦衷，文学起源的原初情景已不可复睹。卡西尔说：“我们必须承认，对于在人类文化哲学中历来占据注意力中心的许多基本问题，我们都是全然无知的。语言、艺术、宗教的起源问题就成为不可解答的。”<sup>②</sup>因而，皮亚杰先生一方面承认每一件事情都有一个起源问题，但另一方面他又说：“从研究起源引出来的重要教训是：从来就没有什

---

① [意] 维柯，朱光潜译：《新科学》上，第193页，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

② [德] 恩斯特·卡西尔，甘阳译：《人论》第3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

么绝对的开端。”<sup>①</sup> 由于资料的缺乏，要探讨文学起源的原初情景，困难重重。由此可见，此前以现存文本为基础的研究方法，不仅是明智的，也是稳妥的。不过，这是常规的研究方法。德国人认为凡是在他们缺乏实证材料的地方就没有任何历史，而只有“史前时期”，才是这种研究方法的体现。但是“如何从这个荒谬的‘史前历史’过渡到真正的历史，我们没有得到任何解释”<sup>②</sup>，这不能不是一个遗憾。

本书的目的就是要叩问文学的“史前时期”，以补足现行的文学史与文学的“史前时期”的历史缺环。

## 二

但是，自古及今，起源问题都令人兴奋不已，它永恒地吸引着人类的探索热情和探索智慧。

在 20 世纪行将结束之际，经历了一个世纪大动荡的古老中国，正在步入现代性社会。回首历史，我们离文化起源时期更加遥远，文学起源的原初情景愈加渺茫。中国古代文化的历史悠久得令人难以置信，古人屡言泰山上封禅的远古帝王有 72 代，而博学的管子也只知道其中的“无怀氏”等 12 代。<sup>③</sup>《庄子》中记载了一些他人不知道的古帝王名字，但是历来都被认为是小说家言，而其实可能是被湮灭的古文化。庄子累累

---

① [瑞士]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第 17 页，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版。

②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3 页，人民出版社 1972 年。

③ 《管子·封禅》。



引古《书》，道古学，盛赞文化“古人有之”，“古之明大道者”<sup>①</sup>，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古文化不断地被时间吞没，在春秋战国时期，古人们早已惊呼“太古之事灭矣”！为“文久而息，节族久而绝”的历史文化抚膺长叹，《史记·封禅书》说：“旷远者千有余载，近者数百载，故其仪阙然湮灭，其详不可得而记闻”。那么两千多年之后的今人，还能不能研究文学的起源问题呢？回答应该是肯定的。因为，文化的发展总是以自然积累为基础。文化的积累和承传主要有两种方式，首先是文化主体有意识的承传。例如《尚书》中的周人对殷商文化无限的尊敬，他们认识到自己的不足，自谦地称自己为“西土之人”（《牧誓》），这无异于说自己是乡巴佬。他们称赞“尔殷多士”、“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多士》），主动向文化先进的商人学习：“往敷求于殷先哲王……”<sup>②</sup>；还派人参观学习，“观政于商”（《泰誓》）；周武王克商以后，亲自向商朝的学者箕子请教和学习古代文化。墨子说，“昔者周公旦朝读书百篇”，周公所读的书，可能就是殷商的典册。这些记载说明，在西周代商的时候，殷商文化已经具有很高的势能，它受到周人的尊崇，并被周族作为先进民族的文化继承下来。因而，郭沫若说“周人的文化是继承着殷人来的”，并举《论语·为政》：“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为证，<sup>③</sup> 是不错的。从现存文化看，商代的文化还与被视为蛮夷的楚国一脉相传，得到楚人较好的继承。而且古代的史官都有主动抢救前朝文献资料的意识，夏

① 《庄子·天道》。

② 《尚书·康诰》。

③ 郭沫若：《十批判书》第9页，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